

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编写理念*

王靖潭¹, 杨 枫²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北京 100024; 2.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46)

摘 要: 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元素是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实践路径之一。然而, 目前鲜有文献讨论教材中国家意识元素的呈现方式, 更缺乏国家意识融入教材的理论研究, 导致国家意识无法系统地、具象化地应用于教材编写。本文立足于外语教材国家意识的内涵, 提出国家意识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理论框架, 包括国家意识的编写需求明晰、国家意识话语的确立、国家意识的任务设计和国家意识的多模态呈现 4 个环节, 深入探讨国家意识有机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具体路径与方法, 以期为我国新时代外语教材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 国家意识; 外语教材; 教材编写; 外语教育

中图分类号: H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4272 (2024) 05-0094-09

0. 引言

近年来, 外语教育应加强对学生国家意识的培养这一理念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 (梅德明 2018; 杨枫 2019)。国家意识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公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 有利于国家的昌盛和民族的强大, 特别是在提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今天, 外语教育中培养学生具有国家意识的责任更加迫切 (刘宏 2023)。外语教材作为外语教学的基本依据, 不仅是文化传承、创新和发展的关键载体 (罗生全、杨柳 2021), 且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研究意义重大, 已受到学者关注 (杨枫 2022a, 2022b; 王靖潭 2022; 赵丹、沈骑 2022)。然而已有文献主要聚焦外语教材中国家意识的宏观探讨, 尚未深入讨论教材中国家意识元素的呈现方式与路径, 也鲜有国家意识融入外语教材的理论研究。本文立足于外语教材国家意识的内涵, 提出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编写框架, 深入探讨国家意识有机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路径, 以期为我国新时代教育强国背景下的外语教材建设提供启示。

1. 国家意识与外语教材

学界对国家意识具体内涵的探讨各有侧重。于海 (2004: 3) 将其定义为“对某一特定

收稿日期: 2023-09-22; 作者修订: 2024-08-17; 本刊修订: 2024-08-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外语教材开发的界面研究”(23FYYB046);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城市形象话语的国家意识研究”(23JCC082)

作者信息: 1. 王靖潭,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功能语言学、教材研究, E-mail: wangjingtian@bisu.edu.cn; 2. 杨 枫,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知识翻译学、外语教育学, E-mail: frankyang@sjtu.edu.cn。

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和语言的归属,并由此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想法和共同的生活方式”。李桂东(2021)注意到归属认同的基础是认知,指出国家意识是公民基于国家历史、民族和文化的科学认知而形成的对国家政治法律的归属认同,也是思想、情感和行动上对国家认同的理性实践。荣司平(2014)对国家意识的概括较为全面,认为国家意识包括公民对国家的认知、认同和期待。

高等外语教育树立国家意识的理念由杨枫(2019)率先提出,强调推行外语教育国际化的同时,必须坚持国家意识。具体而言,就是发挥外语教育在培养和增强国家意识中的积极作用,平衡母语和外语的关系,使外语教育能够有效提升国家认知、推进国家认同、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房洁 2021)。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内涵是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基的外语教育语境下,学生基于对自己祖国历史、文化、国情等的认知认同,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责任感(熊蕾 2015),并做出服务民族复兴大业,致力国家文化遗产、创新与传播,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价值选择和行为实践的情感与心理总和(王真 2023)。

一些学者从外语教材建设方面探索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实践路径。杨枫(2022b)认为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是学校与教师把国家意识的信念结构以投射、再造的方式嵌入外语教材内容体系、实践体系的国家认同过程,并提出注重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元素是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实践路径之一。徐锦芬(2021)从教材编写方面也提出类似观点,主张高校英语课程教材内容需要体现国家意志。然而,目前外语教材极少融入国家意识元素,更罕有教材设计教学模块,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分析,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徐斌 2021)。虽然王靖潭(2022)提出国家意识教材观的概念,但是对外语教材如何体现国家意识等问题未做充分阐释。此外,赵丹、沈骑(2022)构建了大学英语教材国家意识研究框架,从外语人才国家意识培养的视角提出国家认知、国家认同、国家责任和国家期待4个维度,对国家意识如何融入外语教材提供了有益启示。然而,该研究以文化为主要切入点探讨外语教材中国家意识的呈现,其普适性有待进一步拓展。

2. 国家意识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理论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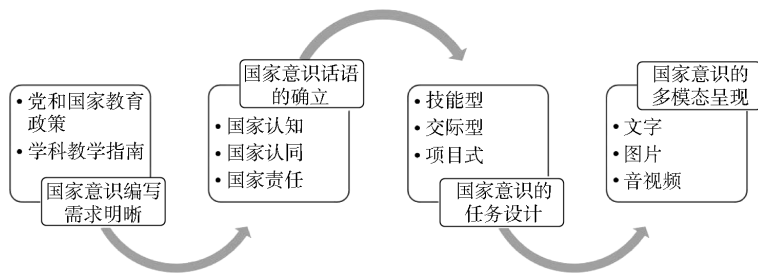
国内外学者对国家意识内涵的探讨为其融入外语教材编写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呼吁应将外语教育的新理念具象化体现在教材编写的全流程(Tomlinson 2012; 文秋芳 2023; 束定芳 2024)。为保证外语教材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学界正努力尝试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外语教材编写理论体系。文秋芳(2023)构建大学外语教材编写理论体系并提出五大要素,其中“国家与社会要求”是外语教材编写的指南针。束定芳(2023)从教育生态理论的视角探讨新时代外语教材理论体系构建,强调外语教材编写必须考虑未来国家发展对外语能力的需求。鉴于此,只有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外语教材理论体系才能为我国的外语教材编写提供重要参考。

回顾国内外文献发现,普适性广、操作性强的教材编写理论框架较为少见。Jolly & Bolitho(2011)提出的外语教材编写流程具有一定代表性,包括7个步骤:1)需求辨识(identification of need);2)问题探究(exploration of problem);3)情景化实现(contextual realization);4)教学实现(pedagogical realization);5)实物产出(physical production);

6) 教材使用 (use of materials); 7) 教材评估 (evaluation of materials)。该编写框架具有一定的操作性, 并被本土化地应用于外语教材编写 (贾蕃、徐晓燕 2023), 但尚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 该框架针对通用外语教材编写, 无法体现出如国家意识等特色化外语教材编写的路径。第二, 该框架个别流程的内涵仍需进一步探讨。例如, 在需求辨识环节, 仅强调关注教材使用者的需求, 忽略了教材建设事关国家事权的重要属性, 教材编写未体现国家意志和需求。第三, 流程涵盖范围较广, 涉及编写、使用和评估等多个环节, 混淆了各环节的主体。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教材使用和评估的主体多为教师和学生, 而非教材编者。

本文基于前人文献研究, 提出外语教材国家意识编写的理论框架, 包括“国家意识编写需求明晰”“国家意识话语的确立”“国家意识的任务设计”“国家意识的多模态呈现”4个环节 (图1)。“国家意识编写需求明晰”是指教材编写原则须明确体现教材的国家事权属性, 以教材为载体深入贯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理念。“国家意识话语的确立”是指教材文本中国家意识话语类型的确定, 涉及3个维度, 即国家认知话语、国家认同话语和国家责任话语。“国家意识的任务设计”是指教材通过设计不同类型的任务和练习以实现国家意识的情景化。“国家意识的多模态呈现”是指教材采用多模态方式选用多种教学资源类型呈现国家意识的各类表征。

图1. 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编写框架



上述4个环节相互关联, 其中“国家意识编写需求明晰”是编写理念, 决定了后续3个环节。后续3个环节属于教材编写的内容设计, 是落实外语教材育人功能培养国家意识的重要路径。“国家意识话语的确立”和“国家意识的任务设计”是重点, 成为外语教材编写的核心。“国家意识的多模态呈现”是载体, 贯穿国家意识话语的确立和国家意识的任务设计。须指出的是, 本文构建的框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非线性流程。例如, 教材编者会依据国家意识话语的类型设计相应的任务, 也可能会依据教材多模态资源的类型调整任务设计的指令和内容。

3. 国家意识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内涵与方法

基于前文构建的国家意识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理论框架, 下面将对国家意识编写需求明晰、国家意识话语的确立、国家意识的任务设计和国家意识的多模态呈现4个方面进行详细阐释, 并深入探讨国家意识有机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路径与方法。

3.1 国家意识编写需求明晰

语言教材反映政治决策、教育理念、语言政策和文化面貌, 通常致力于塑造学生的国家、文化和政治身份认同 (Curdtt-Christiansen & Weninger 2015), 故教材编写应当回应和适应新

时代提出的新要求,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考察近年来颁布的外语规划与政策不难看出,融合国家意识已经成为新时代教材建设的鲜明特征之一。在有关外语教育改革的国家规划和政策中,频频出现“中国风格”“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等与国家意识培育密切相关的丰富表述。这些政策和规划的提出,从顶层设计层面明确了外语教材建设体现国家意识的宏观需求。鉴于此,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编写首先需要在教材编写原则中明确体现教材的国家事权属性,通过凸显“中国特色”相关表述,以教材为载体深入贯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理念。

另外,《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称《纲要》)明确提出各门课程需要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课程思政与国家意识具有同构性,而教材的国家事权属性意味着教材须体现国家意志,决定了新时代外语教材编写首先需要满足融入国家意识这一特殊需求,具体体现为价值观的塑造和正向引领(徐斌 2021)。据此,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编写也应对标《纲要》,深挖思政元素并有机融入教材,承载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根本任务。

3.2 国家意识话语的确立

国家意识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可以通过投射和再造的方式将国家意识元素嵌入外语教材建设之中(杨枫 2022b)。我们在借鉴王真(2023)对于国家意识内涵探讨结论的基础上,认为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话语可分为3种类型:国家认知话语、国家认同话语和国家责任话语。

3.2.1 国家认知话语

国家认知是国家意识的核心基石,也是国家认同的前提,是指公民对一国国情的全方位了解和认知。外语教材的国家认知话语是指教材中文本呈现一个国家国情信息的话语表征,主要包括历史、政治和外交3个方面,即国家历史认知、国家政治认知和国家外交认知(表1)。

表 1. 外语教材国家认知话语的内涵

国家意识话语类型	体现维度	具体分类	国家意识元素
国家认知话语	历史	古代史, 近代史, 现代史。	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 人文精神。
	政治	执政党, 国家政治政策, 法律法规, 治国理政理念。	党的“四史”, 政治制度, “一带一路”倡议, 国家安危、生存、发展、权利、义务、利害等。
	外交	外交政策, 国家定位, 国际关系。	国家安全、形象、话语权、利益得失、荣辱等。

国家历史认知涉及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等,包括对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了解(王真 2023)。外语教材通过提供不同历史阶段的史实资料、相关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介绍,使学生了解国家发展的历史脉络,深化其对国家历史的认知和理解,感知祖国强盛和生活幸福的来之不易。

国家政治认知主要包括对执政党、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认知(王真 2023)。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新时代我国培养的外语人才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政策、治国理政理念有清晰的认知,才能激发内心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可概括为“四史”,包括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对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度认知要结合当前形势与国家发展政策、方针与阶段目标,充分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治国理念。

国家外交认知也是国家意识融入外语教材的一个重要方面。新时代要求我们要以一种更具世界眼光与国际胸怀的国家观来审视国家发展,主动将自身利益与他国关切相联系,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李洁 2019)。国家外交认知包含两个层面:其一,对本国国际定位的认知,涵盖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国家话语权等方面及国家外交政策在国际上的认同与借鉴。其二,对他国以及与他国互动关系的认知。通过展现与目标语国家或区域文化的深入交流,学生可以深化对本国与他国互动关系及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内涵的理解。

3.2.2 国家认同话语

国家认同是指公民将本国的文化传统、历史风俗、国家主权、政治制度、法律法规、道德价值等与他国进行对比,由此产生对本国的认可而形成的归属感(薛博文 2021)。共同的民族、历史、政治、文化、母语等社会表征是国家意识的稳定结构(杨枫 2022c),在国家认同意识的构建中具有重要作用。据此,外语教材中的国家认同话语是指能够彰显对民族、历史、政治、文化、母语认同的话语表征(表2),可以激发对公民身份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体现出对国家的深厚情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始终对国家保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外语教材通过呈现国家认同话语、激发爱国情感和引导实践行为这一潜移默化的方式可以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强化国家意识,实现育人功能。

表2. 外语教材国家认同话语的内涵

国家意识话语类型	体现维度	具体分类	国家意识元素
国家认同话语	民族认同		
	历史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记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自信”,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母语符号性。	身份认同,民族精神,自豪感,荣誉感,归属感,依赖感,眷恋感,获得感,成就感等。
	政治认同		
	文化认同		
	母语认同		

国家认同话语作为国家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首先,国家民族认同是培养公民忠诚感和归属感的根基,体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和强化。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个人、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认识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认知主体的民族观、国家观及身份归属、责任心、价值追求的重要问题(巴玉玺 2021)。此外,国家历史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基于对国情的认知,由认知上升至对本国的自豪感、归属感以及忠诚感等深厚情感(王真 2023),主要体现为铸就外语人才的“四个自信”,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外语人才的价值观中,自觉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认知和认同为己任 (杨枫 2020)。母语认同主要强调外语教材中外语和汉语母语之间结构和文化上的平衡和平等, 凸显汉语知识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关系和联系, 体现为汉字和拼音对世界知识体系建构的影响。

3.2.3 国家责任话语

国家责任是国家意识的具象体现, 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精神, 有必要充分体现在外语教材中。外语教材作为西方语言和文化承载最多的媒介之一, 是学生接触外来价值观的最直接载体, 对大学生国家责任感的培养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学英语教材“不仅需要帮助学生获取正确的国家认知, 树立国家认同, 还需要培养他们热爱祖国、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情怀与责任感”(文旭, 等 2020: 23)。我们认为, 外语教材中的国家责任话语是指能够帮助学生树立助推国家发展和稳定的责任心, 确立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志向的话语表征, 主要涉及 3 个方面: 维护国家安全、建构国家形象和传播国家文化 (表 3)。

表 3. 外语教材国家责任话语的内涵

国家意识话语类型	体现维度	具体分类	国家意识元素
国家责任话语	维护国家安全	国家语言安全, 国家文化安全, 国家主权安全。	汉字, 传统哲学思想, 领土完整, 国家利益, 话语权等。
		文明大国形象, 东方大国形象, 负责任大国形象, 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可信, 可敬, 可爱, 开放, 包容, 和平, 和谐, 繁荣, 稳定, 美丽, 公平, 正义等。
	传播国家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语言, 文字, 文学, 建筑, 绘画, 音乐, 服饰, 习俗, 礼仪, 风俗等。
		革命文化	长征精神, 五四青年精神等。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科技等。

维护国家安全是外语教材国家责任话语的重要内容之一, 源于外语教材承担着维护国家语言和文化安全的重要使命 (徐锦芬、刘文波 2021)。维护语言和文化安全, 可以引导外语学习者进行身份建构和价值塑造, 为国家培养既精通外语又具有国家安全意识的高端人才, 服务于国家安全事务。另外, 外语教材中呈现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话语, 可以使学生在全面了解国内情况的同时, 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 切实维护好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和地位, 有利于提升国家话语权。

教材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媒介。新时代教材国家形象建构不仅是国家责任话语深入教材建设的实践转化, 也是外语教材建设强化国家意识的核心要义 (耿希 2024), 因而建构良好国家形象是外语教材国家责任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形象中的“大国形象”主要包括 4 种: “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 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 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对外更加开放, 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习近平 2013)。

我国外语教育既是语言教育, 更是文化教育, 同时肩负弘扬和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使命。因此, 外语教材应包含中国文化元素, 使学生学习外语的同时, 用外语向世界传播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革命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指中国建设和改革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外语教材中呈现国家文化元素,有利于引导学生坚持中国基因、坚守中华底色、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杨枫 2020)。

3.3 国家意识的任务设计

任务是国家意识融入外语教材的关键环节,不仅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还通过各种练习和活动提升语言能力、学习能力和思辨能力。我们主张在各种类型的任务设计中,通过选择适宜的文本、创设合理的情境植入中国元素,始终贯穿国家意识的浸润和融入。国家意识的任务设计可以涵盖以下3种类型的典型任务:

第一,技能型任务。这类任务设计侧重语言技能的培养,既包括组构知识(如词汇、语法)等典型语言知识,也包括输入性(听、视、读)和产出性(说、写、译)等典型技能。例如,通过语篇填空,针对国家认知话语中历史维度(如历史人物岳飞的个人简介)的典型词汇、语法特征设计练习,旨在训练学生掌握如“精忠报国”“收复故土的爱国精神”等表达。

第二,交际型任务。此类任务真实性相对较高,将任务置于创设的有意义的交际场景中,将国家意识隐含于任务中的语言要点、文化背景、语言技能等,通常包括话题、目的、身份、场合等要素(文秋芳、孙曙光 2020)。例如,要求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代表(身份),在全球生态环保分论坛(场合)中,就中国节能减排具体方案发表观点(主题),旨在介绍并阐释中国绿色生态理念,提出中国方案、彰显中国智慧(目的)。

第三,项目式任务。围绕特定的国家意识话语类型设计任务,完成具体项目,如研究性学习、小组合作等,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协作精神。例如,以“弘扬和传播北京文化”为项目名称,项目活动设计为制作“首都文化纪录片”,内容以介绍北京文化为主,包括但不限于北京标志性建筑、名胜古迹、现代科技创新等,通过电视台、视频网站等平台传播,旨在培养学生宣传和弘扬首都文化的国家意识。

3.4 国家意识的多模态呈现

多模态呈现是指在传递信息时,不仅仅使用语言文字,还结合图片、声音、动画、肢体动作等多种感官和符号资源(张德禄 2024)。已有研究表明,多模态资源通过提供丰富的感官体验和互动机会,极大地丰富了外语教材的内涵和形式,可以增强学生的理解力和参与度(张德禄、张淑杰 2010),对提升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起到了积极作用。我们认为,外语教材融入国家意识的多模态呈现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文本呈现。文本模态是外语教材国家意识呈现的主要方式,所占篇幅最高。从文本类型上看,包括描述、叙述、指示、说明、论述和交流。从题材上看,可以涵盖人物传记、故事小说、文学作品、科学发现、历史材料、新闻报道等。需指出的是,文本除了一定篇幅的课文之外,还可以包括其他文化创新符号或代表性标语等文字。例如,单元开篇可以选取与目标主题相关的体现国家意识的名人名言;练习也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进行。

第二,图片呈现。教材中的图片可以成为传递国家意识的有效工具,帮助学生建立国家

认同感和归属感。教材中的图文呈现方式通常有 4 种：指代、指代—语言、指代—教学、指代—教学—语言（Weninger & Kiss 2013; Xiong & Peng 2020）。1）指代。图片与文字具有指代关系，前者在教材中通常以插图的形式出现。例如，单元主题是中国建筑风格，可选用一张中国古代建筑图片作为配套插图，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国家建筑文化魅力并激发其民族自豪感。2）指代—语言。图文关系主要指文字和对应的图片同时呈现给读者，两者为前后景关系。例如，单元主题是中国民俗诗歌，可通过文字展示诗歌内容，插入相应元素的图片作为文本背景。这种前后景的呈现方式便于快速建立图文联系，感受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文化自信。3）指代—教学。图片与教材活动紧密结合，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文化对比、分析和探究。例如，为深化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在教材活动中展示一张身着各民族服饰的 56 个民族人民大合照，展示不同民族服饰特色的同时，引导学生比较分析不同民族服饰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促进其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培养民族团结意识。4）指代—教学—语言。图片中包含目标语语言信息，通常以漫画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教材中，通过漫画展现中国英雄人物所处的重要历史场景，并配有目标语文字说明，便于学生直观地了解事件经过，激励其以英雄人物为榜样，强化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三，音视频呈现。教材中的音视频材料是强有力的教学工具，可以通过听视觉的结合增强学习体验，同时有效融入国家意识，通常包括 4 种方式：1）主题内容的引入。用外语录制语音、歌曲、广播剧等音频材料，或播放重要事件，如奥运会颁奖仪式等视频材料，让学生直观感受语言魅力的同时提升民族自豪感。2）教材文本的鉴赏。通过朗读、鉴赏外译版的国学经典，让学生感受国家文化内涵，用外语表达对国家的深厚情感。3）文化知识的补充。通过播放外文纪录片、电影片段等视频材料，展示国家的发展历程、社会风貌、民族风情等。4）练习活动的设计。播放具有国家和民族特色的音乐和歌曲，提升文化自信。选取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演讲或著名人物的讲话，鉴赏语言的同时强化国家意识。

4. 结语

外语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必须以树立国家意识为基本出发点。国家意识元素既需要显性映射在全学段、各学科、多类型教材中，也需要预留隐性融入和挖掘的空间，做到显性和隐性有机结合（贾蕃 2022）。本研究立足于外语教材国家意识的内涵，尝试提出国家意识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理论框架的 4 个环节，确立了国家意识话语的 3 种类型，深入探讨国家意识元素有机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具体路径与方法。需要说明的是，国家意识话语类型的体现维度可能并未穷尽，因篇幅受限，尚未针对具体类型的外语教材编写如何利用所提出框架融入国家意识展开论述，后续研究将就此做深入探讨，进一步优化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编写理论框架。此外，借助科技赋能可以推动教材国家意识的数字化建设，并通过文本、声音、图片等多种媒介结合，扩展教材国家意识的空间模态，拓展可感知价值。

* 感谢《外语导刊》审稿专家和西南交通大学贾蕃副教授对本文提出的诸多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 [1] 巴玉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国家意识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6): 35-39.

- [2] 房洁.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中的国家意识培养 [J]. 外语电化教学, 2021, (6): 51-56.
- [3] 耿希. 新时代教材国家形象建构的逻辑起点、基本特征及实践进路 [J]. 现代教育管理, 2024, (3): 85-97.
- [4] 贾蕃. 中国外语教材评估研究 30 年 (1990~2020)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 (1): 83-92.
- [5] 贾蕃, 徐晓燕. 思辨能力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实践研究 [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3, (1): 75-82.
- [6] 李桂东. 首届“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话语体系构建研讨会”综述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1, (3): 109-111.
- [7] 李洁. 论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的新时代意涵 [J].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19, (4): 96-106.
- [8] 刘宏. 以国家话语培养国家意识的外语教育实践探索——局域“理解当代中国”多语种系列教材的分析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3, (6): 1-8.
- [9] 罗生全, 杨柳. 论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法理逻辑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21, (5): 35-42.
- [10] 梅德明. 新时代外语教育应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B/OL]. (2018-02-09) [2024-08-17].
<http://www.iol.shisu.edu.cn/96/29/c5988a103977/page.htm>.
- [11] 荣司平. 论国家意识的结构 [J]. 青海社会科学, 2014, (2): 31-34.
- [12] 束定芳. 教育生态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外语教材理论体系构建 [J]. 外国语, 2023, (6): 20-32.
- [13] 王靖潭. 国家话语能力视阈下外语学科国家意识教材观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 (1): 93-102.
- [14] 王真. 新时代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培育逻辑、内涵与结构 [J].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3): 106-113.
- [15] 文秋芳, 孙曙光. “产出导向法”驱动场景设计要素例析 [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0, (2): 4-11.
- [16] 文秋芳. 构建大学外语教材编写理论体系 [J]. 外国语, 2023, (6): 2-11.
- [17] 文旭, 文卫平, 胡强, 等. 外语教育的新理念与新路径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0, (1): 17-24.
- [18] 习近平.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EB/OL]. (2013-12-31) [2024-06-06].
<http://www.qizhiwang.org.cn/nl/2020/0820/c433581-31829774.html>.
- [19] 熊蕾. 国家意识与国际传播 [J]. 对外传播, 2015, (3): 32-33.
- [20] 徐斌. 高校外语课程思政中的国家意识培育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1, (4): 35-41, 49.
- [21] 徐锦芬. 高校英语课程教学素材的思政内容建设研究 [J]. 外语界, 2021, (2): 18-24.
- [22] 徐锦芬, 刘文波. 国家安全视域下外语教材建设的内涵与路径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1, (5): 73-79, 120.
- [23] 薛博文. 时代挑战与实践方向: 国家认同教育的阐释与路径 [J]. 中国教育学刊, 2021, (8): 83-88.
- [24] 杨枫. 高等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跨学科精神及应用理念 [J]. 当代外语研究, 2019, (2): 1-2.
- [25] 杨枫. 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文化政治学阐释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0, (6): 1-2.
- [26] 杨枫. 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时代困境、内涵结构与实践路径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2a, (2): 91-96, 148.
- [27] 杨枫. 国家意识与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兼论新文科视野下的外语教育实践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2b, (2): 1-5.
- [28] 杨枫. 国家意识的外语教育话语实践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c, (2): 1-2.
- [29] 于海. 民族精神意涵: 国家意识、文化认同、公民人格 [J]. 思想理论教育, 2004, (12): 3-9.

(下转第 111 页)

- [18] Merschel, L. & J. Munné.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mong 6th–12th grade world language teachers [J]. *L2 Journal*, 2022, 14 (1): 60–76.
- [19] Niño, A. Exploring the use of online machine translation for independent language learning [J]. *Research in Learning Technology*, 2020, 28: 1–32.
- [20] O'Neill, E. M. Training students to use online translators and dictionaries: The impact o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scor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Studies in Language Learning*, 2019, 8 (2): 47–65.
- [21] Prentice, F. M. & C. E. Kenden. Paraphrasing tools, language translation tools and plagiarism: An exploratory stud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ducational Integrity*, 2018, 14 (11): 1–16.
- [22] Reidina, J. & S. Yuliani. The influence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dependency on translation skill [J]. *Borneo Educational Journal (Borju)*, 2020, 2 (1): 36–49.
- [23] Richmond, I. M. Doing it backwards: Using translation software to teach target-language grammaticality [J].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1994, 7 (1): 65–78.
- [24] Selcuk, H., J. Jones & H. Vonkova. The use of Google Translate as an ICT tool in web-based collaborative writing: Self-reported accounts of EFL learners [C] // H. Kratochvilova & R. Kratochvi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IAC 2019. Vienna, 2019: 74–80.
- [25] Tsai, S. -C. Using Google Translate in EFL draft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J].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019, 32 (5/6): 510–526.
- [26] Vygotsky, L. *Mind and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Mental Processes*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责任编辑 高一瞳)

(上接第 102 页)

- [30] 张德禄. 教育语言学的超学科性和多模态性探索: 系统功能视角 [J]. 外语导刊, 2024, (1): 1–10.
- [31] 张德禄, 张淑杰. 多模态性外语教材编写原则探索 [J]. 外语界, 2010, (5): 26–33.
- [32] 赵丹, 沈骑. 大学英语教材中的国家意识研究: 框架与方法 [Z]. 外国语文研究 (辑刊), 2022, (1): 103–118.
- [33] Curdt-Christiansen, X. L. & C. Weninger. *Language, Ideology and Education: The Politics of Textbooks in Language Educ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15.
- [34] Jolly, D. & R. Bolitho. A framework for materials writing [C] // B. Tomlinson. *Materials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Teaching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7–134.
- [35] Tomlinson, B. Materials development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J]. *Language Teaching*, 2012, 45 (2): 143–179.
- [36] Weninger, C. & T. Kiss. Culture in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 textbook: A semiotic approach [J]. *TESOL Quarterly*, 2013, 47 (4): 694–716.
- [37] Xiong, T. & Y. Peng. Representing culture i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extbooks: A critical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J].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2020, 34 (2): 163–182.

(责任编辑 刘心)

Spatial Markers of the Category of Approximate Quantities in Russian and Chinese: Grammaticalization, by XU Ying-ping, DONG Hong-jing, ZHANG Jin-zhong, p. 069

The feature of the spatial category serving as the source domain creates possibility of it being used as the cross-category marker, as is the case with quantificati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into the quantification category is, to some extent, restricted to this category per se. Grounded on the inhere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bove two categories, this paper makes a cross-domain analysis of the markers of approximate quantities. It focuses on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parallel yet separate representations of these markers in Russian and Chinese, concerning the dynamic evolution, classif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grammeme shifts, and semantic constraints. Meanwhile, it aims to describe the motivations behind language properties, language users' ways of thinking and national culture.

A Study of the Concept Transfer Mechanism of Anaphora in Japanese Discourse Based on the Three-Stage Theory, by MA Lan-ying, LU Huan, p. 078

The phenomenon of anaphora in Japanese discourse is quite complicated. In particular, when the antecedent is a phrasal one, the anaphora has various forms, and consequently, the concept of the antecedent transfers in different ways. In this paper, we adopt the "Three-Stage Theory for anaphora" proposed by Wang & Gao (2009) to study this phenomenon. When the anaphora is a demonstrative, the concept of the event described in detail by the antecedent is restated as "this/that (thing)" in its simple form with empty meaning. When the anaphora is "demonstrative adjective+nominal", due to the relatively rich meaning of the nominal, the concept of the event is transferred to the referent in different ways. The nominal can not only transfer the same concept with the antecedent, but also add subjective evaluative meaning, and extend the antecedent concept. When the anaphora is a bare noun, it can also transfer the same concept like "demonstrative adjective+nominal". All these ways of concept transfer are based on the nominalization or adverbialization of the antecedent by the anaphora, so that the nominalized or adverbialized antecedent can appear in a certain syntactic position of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expressing the same or related concept with the antecedent, and thu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ourse.

How to Assess Interactional Competence: Implications from the TOEFL Writing Task, by WANG Chu-ming, p. 087

Interactional competence stands as a pivotal element influencing the acquisition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field of language testing has been actively engaged in scientific inquiry regarding its evaluation. Despite prolonged research efforts, the absence of a robust proficiency test grounded in the construct of interactional competence remains notable. The challenge does not stem from a lack of interest on the part of assessment specialists to develop such a test but rather from the inherent complexity associated with manipulating this construct. Nonetheless, ongoing endeavors to achieve a breakthrough in this area persist.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ccurred in 2023 when TOEFL introduced a reading-writing integrated continuation task. This novel task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assessment of interactional competence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continuation task utilized in China's National English Matriculation Test. Such advancements may stimulate contemplation among testing researchers in their pursuit of effective assessment methodologies.

Develop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with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y WANG Jing-tan, YANG Feng, p. 094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element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is one of the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Yang 2022a). Currently, there is a lack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amework for present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extbooks, resulting in the inability to systematically and concretely apply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o teaching material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integrat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to the prod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including four dimensions of production requirements, discourse identification, task design and multi-modal presentation, thoroughly exploring the specific paths and methods for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to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vides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new era.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mpact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ssista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Learners' Writing Ability, by WU Zhi-hui, p. 103

The use of machine translation tools in English learning has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but its actual impact and potential risks on language learning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understood. This study involves 360 university English learners in a six-week machine translation-assisted English writing training experiment. The degree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ssistance is quantified, and combining with data from writing practice reports, we observe the changes in students' English writing proficiency and compare them with those of a control group.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chine translation assistance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English learners' writing proficiency. It has a beneficial effect on students of different English levels. Low and medium level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ssistance can enhance the writing proficiency of all English learners, while high levels of assistance do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writing proficiency. This study helps language teachers understand the varying impact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ssistance on writing proficiency and provides stronger support and guidance for teaching practice.

Sci-tech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 Case Study of Xu Guangqi, by ZHANG Bi-sheng, p. 112

Sci-tech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practice of systematically introducing western sci-tech knowledge in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During the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Chinese scholar-officials cooperated with western missionaries to translate a series of sci-tech works and introduce abundant sci-tech knowledge to China. In this process, Chinese sci-tech translators also fully demonstrated their subjectivity as translators. This paper takes Xu Guangqi and his works, *Geometric Elements* and *Tessie Water Act*, as examples to analyze the sci-tech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t is found that these translators constantly adjusted thei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ir cultural background, value orientation and personal abilities when translating Western sci-tech works. This was done to remain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text while making the translated knowledge more comprehensible to Chinese readers and better serving society. The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sci-tech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shows that the achievement of translation relies not only on the training of translation talents but also depends on the exertion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his approach helps present the translated works to the public in a way that is easier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understand. In additi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s sci-tech translation suggests the need to create a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sci-tech translation,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ci-tech civilizations and ideas, and build a translation system with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s its core. These steps promo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i-tech translation.